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2.025

边缘话语的狂欢:我国当代 语文教育的个体性言说

王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以人为本”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也成为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主流话语。对个体性言说的日益关注与重视,使语文教育话语场发生了重要变化:边缘话语呈现出主流化趋势,中心话语则呈现出弱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失语状态。教师话语的拔根式批判,学生话语的自由式表达、民众话语的娱乐性狂欢,使得语文教育正在成为个体性言说的狂欢疆域和边缘话语的盛宴。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小学语文教育应当规约个体性言说,提倡总体性话语:消减后现代主义的负面影响,增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的倡行,坚守教师的合理权威;祛除消费文化的消极干扰,坚持主流媒体的积极引领。

关键词:语文教育;边缘话语;狂欢;反思

中图分类号:G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2-0170-07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在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政治格局的民主化进程的强力助推下,“自由”“个性”与“主体性”得到尊重、肯定和弘扬,“以人为本”理念逐渐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人文主义话语成为我国当代教育领域中的主流话语。我国当代教育的个体性言说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话语景观:“支流”对“主流”的冲击,“杂音”对“主调”的掩盖,“弱势”对“强势”的挤压等^①。简言之,“边缘”对“中心”的扩张导致其话语日趋强大。在“我边缘故我有理”甚至“我边缘故我真理”的思维逻辑下,边缘以某种“横站”的话语方式与行为习惯,开始不断冲击并消减着社会主流意识与价值观的认同影响,从而出现了边缘话语(即非主流话语、少数者话语或弱势话语)的主流化趋势。这一话语景观既体现在生活领域中,也反映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中。

在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中心话语主要指的

是由教育行政决策者发出的官方话语。官方是掌握着国家政权并站在国家立场思考与行动的集团,往往通过制定和实施教育政策、教育法规等,规约或舆论引导教育评价等,传达出国家对教育的各种规定与社会使命。官方话语代表着国家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边缘话语即民间话语,主要指的是由教师、学生和民众(包括学生家长以及其他社会人士)所发出的个体性话语。教师、学生和民众多半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亲历者或关注者,他们往往以札记、随感和征文等叙述形式,表达个体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实际生存状态,其话语往往情绪化偏浓而缺乏足够的理性。因此,民间话语有可能成为官方话语的忠实诠释者与践行者,也有可能成为官方话语的批判者甚至背离者^②。事实上,当代语文教育领域中的边缘话语正解构着中心话语的价值与意义,中心话语呈现出弱化甚至一定程度的失语状态。对个体性言说的日益关注与重视,则诚如阿尔贝·雅卡尔所言,其“可以沿着解放的方向发生作用,也可以相反,

收稿日期:2019-11-20

作者简介:王超(1971—),女,湖南祁东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①雷颐:《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读书》1995年第4期。

^②胡福贞:《论教师的个人话语权》,《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年第3期。

沿着禁锢的方向发生作用”^①。当代语文教育正沿着禁锢的方向,成为个体性话语的狂欢疆域和边缘话语的盛宴。

一 教师话语的拔根式批判

这里的教师既包括关心语文教育的中小学教师,也包括关注语文教育的高校教师。教师是受社会和国家委托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的人员,教师的一切教育活动应该体现出国家意志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然而,学校课堂既是每一个教师行使“制度性话语”的场所,也是实践教师“个人话语”的场所^②。作为制度性话语,教师是要服从于国家意志和社会制度的,但作为个人话语,教师却发出批判与反思的主强音,并对我国主流教育价值产生离异作用。这种离异作用冲击乃至危及着我国语文教育的主流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丧失对语文教育价值的信心。事实上的确如此,作为个体言说的教师话语往往以批判与反思为名,举起“生命”“人性”“个性”“主体”等人文大旗,采用连根拔起式策略,以激进姿态对语文教育进行质疑乃至否定,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 教师话语对政治、权力、权威的质疑和对意识形态的偏见

语文教育自20世纪末以来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与批判场域,也备受教师群体的诟病。1997年11月,《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文学教育”为题,刊发了一组3篇文章: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和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分别从小学、中学、大学三方面反映中国语文教育的弊端,并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③。随后这3篇文章被多家报纸和电视台转载或报道,还被冠以“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的警示语。1998年,《北京文学》又陆续发表了10多篇批判文章,其中以洪禹平的《误尽苍生》措辞最为严厉。此后,教师对语文教育的批判不断,如王丽的《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1998);孔庆东、摩罗等的《审视中国语文教育》(1999);孙绍振的《直谏中学语文教学》(2003);孙永久的《〈项脊轩志〉:一只省略的耳

朵》(2004);潘晓凌、薛田的《教科书:删得掉的文字 删不掉的秘密》(2009);郭初阳、蔡朝阳等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2010);王淦生的《被阉割的语文》(2011)等。这些批判言辞尖锐,且多将矛头直指语文教育领域中的政治、权力与权威等话语。

批判者认为,政治的强渗作用是造成现今语文教育种种弊病的渊藪之一,也导致了人的异化,要想摆脱这种困境,使人成其为人,就得政治脱敏。这些批评固然较为真切地反映了以往语文教育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对于纠正政治庸俗化倾向以及弘扬人文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体现出批判者学理素养存在某种欠缺,即倾向于简单否定政治性话语的时代意义和当代价值,倾向于疏远甚至切断语文与政治的联系,以至于不时有教师呐喊“让语文的归语文,让政治的归政治”。教师话语这种政治性与人文性的二元对立思路,不利于真正理解我国语文教育的复杂性与现实性。与对政治的偏见紧密相关的是,批判者对权力、权威也抱持偏见,认为它们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霸权,并将权力与权威话语统统纳入霸权话语的行列。但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建制下,国家权力已由全能而无限的权力转向优势而有限的权力,国家职能由垄断式控制转变为潜在渗入。课文的解读价值取向已从批判、揭露的浓厚政治色彩逐渐趋向多元、正面、积极的色彩,也能提供“可供选择”的权力了^④。可以说,语文教育领域内合理而完善的权力话语是一种向心力话语,它是规范、型塑、约束人与教育发展作用的指令性行政话语,是语文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制度保障^⑤。

同样,批判者对意识形态问题也采取偏见态度,将意识形态视为霸权的核心,直接等同于“虚假”“欺骗”,是理应被祛除、被终结的对象,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习惯采用贬义否定性,鲜少赋以中立的描述性意义与褒义的肯定性意义。因此,不少教师将“意识形态”或是简化为“政治意识形态”,只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之维而忽略其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审美、哲学等维度,或是窄

①傅书华:《重在深层的清理与反思》,《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

②王超:《真话语与假权威——论语文教师在课堂中的地位》,《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2期。

③张伟忠:《现代中国文学话语变迁与中学语文教学》,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④吴永军:《课程社会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⑤刘茂军,孟凡杰:《制度性课程话语研究引论:问题、方法与意蕴》,《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3期。

化为“统治阶级或主流阶层的意识形态”,是具有隐蔽性、欺骗性的“虚假的意识”。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强控作用才直接导致了教育现实的种种困境与“病相”,使受教育者异化为社会人、工具人、单向度的人等^①。他们以为,只要在思想观念上自觉批判这些虚假意识,摆脱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的外衣”,就可以使受教育者走向全面发展的澄明之境。这些批判者忘记了教化或教育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的基本事实,其批判缺乏“对人不对己”的自反性思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简化和窄化的意识形态概念混淆甚至抹煞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疏漏了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②。可见,“意识形态”并非通常认为的那种“虚假的意识”“歪曲的反映”,其意义更为宽泛和中性,简单来说它是某一个人或某一社会集团的一种观念体系与思想体系。主流意识形态具有规范生活、统合力量以及凝聚人心等各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的意识形态则是构成一个民族精神信仰的基础和载体,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中枢和支柱。因此,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我国语文教育话语的核心价值之一。

(二) 教师话语对宏大叙事的简单解构和对细小叙事的极力倡导

在教育领域内,教育行政决策者代表国家权力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主体表述的主要是一种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往往与政治结构及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批判者认为,语文教科书鲜明体现了宏大叙事的特征,如国家至上、领袖崇拜、英雄榜样之类的重大主题以及政治思想、道德价值之类的选文取向。在他们眼里,宏大叙事内蕴着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否定,因为这种和崇高、牺牲、奉献、革命、理想等关联的宏大叙事远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剥夺了普通人的平凡幸福和世俗快乐。“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成为风尚,那些曾经感动了一个时代的作品被指责为“国家权力话语”摹本,那些克己奉公的英雄形象被嘲弄为虚假的、非人的、无我的“木偶”。在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与解构声中,代之而起的则是对细小叙事即日常生活叙事的极力倡导。细小叙事追求私人性

与温情性叙事,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单一叙事主题。在当代这个追逐自由、尊重差异、张扬个性、关爱生命、淡化政治的时代,曾经扬“民族国家”的主流观念转变为扬“日常生活”的主流倾向,曾经“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曾经的“革命的故事”为“活着的故事”所取代,曾经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为冷静的客观主义所取代。当语文教育内容专注于个人目的与个性化内容,日常生活叙事在敞开个人生命、主体意义,重视个体的存在感与幸福感之时,难免遗漏了民族的集体存在感与幸福感,忽视了国家价值共识的重要性,语文教育内容呈现“碎片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碎片化”的语文教育内容折射出当前社会是一个缺乏激情、牺牲、献身等精神质素的时代。日常生活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对抗与替代,在消弭政治话语、革命话语的同时也取消了对历史结构性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介入的可能。这种逃避国家、民族、政治等宏大主题,拒绝高尚品质、伟大精神、远大理想等话语的日常生活叙事,在将碎片化的个人日常体验认定为唯一的生活真实并推至极致的同时,也成为另一种宏大叙事。

总体而言,教师话语对于人性、个性、生命、生活的人文高扬出现了人生终极意义的“空场”问题,对政治、权力、权威、意识形态和宏大叙事等的批判与解构,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教师话语的这种连根拔起式批判一笔抹杀七十年乃至百年语文教育之功,并“以釜底抽薪的批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令人绝望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那些‘揭老底’的批判所造成的社会心理损失,很少有人去想到那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③。很显然,教师话语的拔根式批判是缺乏负责的政治态度和积极的教育实践立场的。

二 学生话语的自由式诠释

随着新课改的推行,“以学生为本”(也即学生中心、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将“学生”作为一切的最高价值来规范语文教育教学,学生成为语

①刘猛:《匿影缠绕: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③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文教育教学活动的真正话语主体,能够充分表达对语文教育问题的体验与感悟。在学校教育中,唯“学生中心”理念使得学生话语成为一种无限制的自由表达。“平等者中的首席”观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反对中心、消解教师权威的注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成为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是可以脱离具体教学场境而被视为两个成年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于是,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由原来的教学话语的控制者转变为引领者,而曾经处于缺失状态的学生话语在赋权中开始成为一种凸显话语,赏识教育、成功教育、愉快教育等风行起来,一味讨好学生成为当下教育的通病,“学生中心”演变成“学生主人”“学生专制”。学校教育旨在用取悦儿童来替代培育学生的智力发展,教师廉价的肯定与赞美被打包给学生而满足其消费者口味和予其以成就感,语文课堂教学中一切主流价值观都被消解,权威被视为对个体的压制和奴役而摒弃,学生有权随意解读文本,有权自由表达自己的任何价值观和个性化阅读。其结果是多元解读泛滥,无限衍义普行。比如,《愚公移山》中的愚公既破坏了生态环境,又没有经济头脑和效率观念;《南郭先生》中的南郭先生有参与意识,善于抓住时机,敢于激流勇退^①;《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有钱不用还要自杀真是傻冒”;《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中的“鲁提辖身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②等等。

在唯“学生中心”的语文教育中,学生的自由诠释成为一种漫无目标的“野餐”: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创新思维却最后演变成唱反调、求怪求俗、“怎么都行”,个性化解读异化为自由化解读。当学生读者对文本解读的意义决定权被扩大到可以无视文本的存在而导致无限衍义时,个性化解读、多元化解读和批判性解读等就容易滑入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泥淖。同时,文本意义的无限拓殖也就使得文本意义虚无或异化,学生的解读成为一种在无底棋盘上所随意进行的无聊游戏,游戏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游戏本身,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真理。

三 民众话语的娱乐性表达

“民众”并非政治语言,其宽泛涵义与大众、公众、群众等概念接近,它是由文化、素养、价值、利益等各不相同的甚至相互抵触的众多团体或个人组成的一个想象共同体^③。可以说,民众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概念,是一个精华与糟粕交杂所构成的独特形态,并非专指阶级性、阶层性均被剥夺的均质的大众。作为民众情绪与利益的表达方式,民众话语反映了一定时期的民众生存状态、权力诉求与社会理想。在当代社会,随着民众社会地位的提高与话语权力的增强,民众话语对国家行政决策与教育变革产生越来越多的重要影响,开始在教育领域显露出它作为社会消费与娱乐主体的意义,逐步由边缘走向中心,并对原来的中心话语起着潜在的反抗、消解和建构作用。

在语文教育领域,民众多从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文视角出发,批判和否定语文课程话语强调社会群体和社会政治学的视角与立场,并往往以戏谑姿态展现着自身的独特存在,这主要体现在《Q版语文》的颠覆与网络的狂欢。《Q版语文》(2004)是民众话语即大众话语的典型代表,旨在极度反讽与彻底解构精英话语。此书虽然并非语文教科书,但由于其内容与课文息息相关且写法相当独特,对语文教育产生了不少影响。《Q版语文》作者将大众耳熟能详的31篇经典课文改编成“无厘头”的荒诞故事,利用改编后的人物、情节以及表达方式来调侃甚至颠覆一切。譬如,《一件小事》中的“我”乘坐夏利出租车时,首先发现计价器作假,然后遭遇出租车撞倒女孩等一系列事件;“孔乙己”偷窃光盘仅仅是为了资源共享等。同时,在编排方式上,该书也极力模仿语文教科书,每篇课文都会附上课后习题。此外,在话语表达方式上,作者力图打破时间、地点、文化等级的限制,把古语和今语、雅语与俗语、宏大话语和琐碎话语随心所欲地并置在一起^④。可以看出,《Q版语文》的热销典型地体现了大众话语冲击和颠覆学校语文教育中主流价值取向的倾向,其背后隐藏着价值虚无主义,这给传统经典、主流文化及其意义建构带来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同时,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民众往往在

①乔改凤:《接受美学与文学作品阅读教学中的“多元解读”》,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温小军:《辨明学生生活经验的语文课程价值》,《课程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③张建:《决策者-精英-民众视角下的俄罗斯国际观研究(2000-2016)》,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④杨海燕:《中学语文教育与现当代文学》,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QQ、BBS、微博客等网媒上随意言论时事,针贬语文教育时弊,互联网成为表达主次不分、高下不分、对错不分的主要“民间舆论场”,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民众话语狂欢局面。具体而言,民众通常从个人利益出发、以“小我”与“人的生命”为标准,基于常识性的生活视角,将那些远离日常生活的神圣、庄严、崇高的东西,也注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用庸常、形下、世俗甚至玩世不恭的嬉戏态度来解读与评判。这种个人娱乐性话语,漠视或摒弃语文教育的社会教益性作用,让神圣感消失,让敬畏感无存,如“恶搞雷锋”“戏谑邱少云”等闹剧充满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对我国的革命精神、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进行了毫无底线的挑战。民众这种“告别革命”“去政治化”的思想言论已成为近些年来舆论场上的一股强劲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文教科书中“红色经典”的选择问题。其实,真正需要批判和反思的主要是红色经典中那种绝对化、单一化的宏大叙事和程式化、概念化、政治图景化等内在缺陷,而非全部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选文出于与学生生活接轨的考虑,但并不意味着需要彻底遗忘和完全拒斥红色经典中可资借鉴的革命传统^①。

四 对边缘话语狂欢的反思

在语文教育领域,针对当前过分推崇个体性话语或边缘话语合理性的趋势,而原来真正的总体性话语或中心话语存在被遮蔽甚至去合法化的可能倾向,我们在尊重个体性话语的理性表述的同时,应该重视总体性话语对个体性话语的必要规约和引领。

(一) 消减后现代主义的负性影响,增强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教师话语的拔根式批判表面上展现的是一种过度反思,其实质则反映出一种文化不自信和价值观危机,体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我国语文教育价值的深刻影响。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表征为:对宏大体系的遗弃、解构和嘲弄,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激进反思,对大众化无拘无束的接纳和热衷。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多元与个性,主张去权威和去中心,它在解构着中心、权力、权威、理性、整体等特性的同时,也在解构着与这类词语紧密相关的价值观与体制,使得人们对社

会意识形态产生认同危机,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浸渍人类精神领域和价值领域。因此,我们在理性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应努力消减后现代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负性影响,增强核心价值观认同,形成价值共识和话语共识。可以说,我国当前课改出现的一些新词、热词,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等,在某种意义上是针对社会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所提出的价值观念。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与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与影响着所有的价值判断。我国的语文教育理应体现和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②,这既是学生社会化的必然过程,也是任何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都会对下一代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必然要求。捍卫理性的现实政治,这是语文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教师话语的应有之声。

语文教育领域还应提倡国家宏大叙事与个人生活叙事的共存,用国家宏大叙事引领个体生活叙事。这是因为以个体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微小叙事在极端强调个人主体的话语权力与话语自由时,显然在有意疏离与拒斥以国家民族、人类命运为基础的宏大叙事。马克思指出,人既是个体性存在,也是社会性存在。在语文教育领域中,我们首先要将日常小叙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小叙事不能代替与否定大叙事,反之亦然。语文教育中的宏大叙事(尤其革命叙事、红色叙事)并不必然内蕴着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否定,尤其在这个允许众声喧哗、容纳开放多元的时代,英雄人物与普通人物应该共存于语文教育话语空间,那些涉及国家政治主题与革命传统题材的选文也不应被排除在外。语文教育中的细小叙事和宏大叙事是可以相容的,教育内容既应联系学生的生活世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无需躲避甚至歪曲崇高,真实的生活世界本就内蕴着政治生活、革命传统之类的宏大叙事。

(二) 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的倡行,坚守教师的合理权威

自新课改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来,“学生”成为规范语文教育教学的最高价值,尤其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以学生为本”即“学生中心”演变成“以学生为主任”“学生专制”,个性化解读

^①施敏:《思想教育与经典建构——1949年以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社会学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②刘洁,李运兰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炼及其传输》,《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异化为“怎么都行”的自由化解读。这些问题实则源于我们未能正确理解“以人为本”理念和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我国的“以人为本”理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哲学为指导的,而非以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传统的“人本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以人为本”强调具体的人,“人本主义”强调抽象的个人;“以人为本”强调人民的利益,“人本主义”强调个人的人权;“以人为本”把人作为目的又作为手段,“人本主义”只是以人为目的^①。因此,我们不能将我国的“以人为本”解读为西方的“以个人为本”。然而,在语文教育理念与实践上,不少学者往往将“以人为本”误解与误用为“以个人为本”,以至于形成了个人至上、学生至上的极端人文倾向,进而产生诸多教育教学弊端。

与对“以人为本”误解与误用紧密相关的是,人们对“学生中心”论的过分推崇。针对“学生中心”取代“教师中心”并逐渐演变成“学生专制”的趋势,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学生中心”论的倡行,并重新树立教师话语的合理权威问题。“学生中心”论打破了原先师尊生卑的等级关系,但却无意中重构了生尊师卑的新等级关系,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再度紧张与对立。我们赞成学生中心论对教师中心论的反思,但是现实的教育过程始终是成年人引领着未成年人,知之多者引领着知之少者;教师在尊重学生各种兴趣和需要的同时,必须理性认识到这种尊重的边界^②。这种尊重的边界在于,倡导平等民主的对话教学并不必然意味着教师应该停止权威讲话,或者说教师一定要假装在各个方面都与学生完全相同;民主教学并不是通过创造一种知识相对主义的自由竞争氛围,让所有的事情都各行其是,从而使得学生一片迷惑;民主教学也并不是让教师放弃对学生行为进行判断价值的必要责任^③。诚如伽达默尔所言,权威最终不是某种基于盲目服从或者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与认可他人在某些判断、见解等方面超出自己的行动^④。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否定一切权威,语文教育应该坚守教师的合理权威,教育中的自由不是为囚徒松绑,也不是给松

绑的囚徒以各种随心所欲,而是要培植儿童的内心宪法,形成少年的良好习惯,培育青年的理智能力,他们将因内蕴着合理权威的教育而获得自由^⑤。

(三) 祛除消费文化的消极干扰,坚持主流媒体的积极引领

消费文化是一种执著于当下的文化,淫浸于消费主义的人既不关注未来,也不关注历史,而是眼睛紧紧盯着当下。历史意识隐退,记忆娱乐化。在消费语境中,抽象化的人性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等对立的概念与内容,成为去革命、去爱国主义、去英雄主义的身体放纵,人们躲避崇高和消解崇高,于是“卑微”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个崇高主题,不少网民在一些非主流媒体以从众与不负责任的方式肆意参与着信息和欲望的狂欢^⑥。实质上,娱乐至上的民众话语体现出精神引领的匮乏。相对于边缘媒体的过度关注与炒作,国家主流媒体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缄默。

因此,当代语文教育在消减后现代思潮负性影响的同时,应坚持主流媒体的积极引领。主流媒体要及时跟进与有效监管,既从制度和观念层面进行监管,也从实践层面和边缘进行良性话语互动,引导舆论新格局。如制定网络言论自由应有度的制度,树立网络言论自由应有度的观念,强调边缘话语的伦理度量,亦即作为个体言说在追求自己广泛自由的同时,要担当一些社会责任,更不能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国家主流媒体及时发挥其本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和边缘媒体进行良性的话语互动,形成主流媒体舆论场引领民间舆论场的新格局,以营造一个多元而和谐的语文教育话语领域。

五 结语

当前是一个“崇尚自我放逐”的时代,伴随着人文至上的价值理念、解构一切的后现代思潮和享乐至上的消费观念,中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中的边缘话语呈现出主流化趋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

①史少博:《论“以人为本”与“人本主义”之异同》,《理论学刊》2006年第1期。

②何雪莲:《谁? 怎样的中心? ——学生中心论质疑》,《教育科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③颜敏:《新课程背景下对话教学的困境与思考》,《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6年第7期。

④杨泽树:《同调与异趣——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对话》,《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

⑤刘云杉:《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2期。

⑥王超:《消费语境下的身体悖论及其反思》,《求索》2016年第9期。

认识到,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需要在克服缺陷的同时仍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诉求,我们仍需加强话语的思想地基,因为语文教育不是简单的话语表达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知识内容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语文教育应坚守自己母语教育的本土立场和民族传统,应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认同,有机融入核心价值观;语文教育必然具有公共教益性而非个人娱乐性,它需要寻求的是较多的共识性话语而不是完全各行其道的

异声。我们与其长期情绪化地批评和娱乐“中国式”的语文教育,倒不如停止怨气、怒气,理性思考如何优化“中国式”的语文教育^①。真正有意义的批判与反思不应是一种连根拔起式的革命立场,不应是一种自由式的诠释态度,更不应是一种娱乐至死的虚无心态,而应是理性地为当代中国当代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合理性的修正,优化中国式的语文教育理论与实践话语,建构具有中国品性、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话语体系。

Carnival of Marginal Discourse: Individual Spee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WANG C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ization and pluralism,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and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Chi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rn and over-emphasis on individual discourse, the discourse field of Chinese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important changes, i. e. marginal discourse shows a trend of mainstreaming, while central discourse shows a weakening or even a certain degree of aphasia. The radical criticism of teacher’s discourse, the free expression of students’ discourse, and the entertainment carnival of public discourse all have made Chinese education a feast of carnival territory and marginal discourse of individual discourse. Under the current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Chines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hould regulate individual discourse and advocate overall discourse;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ost-modernism and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of core values; rationally treat the advocacy of student-centered theory, adhere to the rational authority of teachers;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terference of consumer culture, and adhere to the active leadership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Key words: Chinese education; marginal discourse; carnival; reflect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王超:《新中国语文课程话语流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